

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异化论和生态危机论

○ 刘 京

(丽水学院 管理系,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生态危机是当代最为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研究这一问题,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导。法兰克福学派把消费异化与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和社会结构性危机。

[关键词]消费;异化;生态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恩格斯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马克思、恩格斯还以大量、翔实的调查数据和资料论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状况及其严重危害,指出盲目的生产方式是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3]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西方一些理论家也开始了对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生态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立足于总体异化理论剖析了消费、生态等问题。本文着重对法兰克福学派

理论进行评析。

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条主线。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由此进一步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是渐渐地离开资本主义制度去批判科学技术,把一切都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学派的消费异化论和生态危机论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消费异化论

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症结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不仅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一般老百姓的物质需求也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4]马尔库塞、弗洛姆指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和普遍,并且已渗透到人的消费过程中。就消费而言,它的意义本来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感情和判断力的,进行着有意义、有人情味、创造性的消费。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却异化了,即它背离了本来的意义,被赋予了其他意义。这表现在,它已被资本家所操纵,和人的真正需要失去了联系,并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新形式。

第一,西方人成了失落自己个性,只图贪婪占有的“消费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下,人们往往把自我价值、品质、人格、技术、知识和情感等一切都化为市场交换价值,以财富和消费的多寡作为自己是否幸福的标准,用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它对人格的影响是形成了人们两种极端的社会品性:绝对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大家把最大限度的消费、享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和需求。“他们贪婪地消费着这一切,吞噬着这一切。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我们则永远在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在失望。”^[5]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已经成为人们在性欲和一切物质消费方面的主要潮流”。^[6]人们缺乏活力,几乎毫无情感,人和物之间是一种彻底颠倒了的关系。他们可以分享消费社会的舒适,但只是简单地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活内容,只是为了使商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不仅已经异化为物,而且更进一步异化为商品的奴隶,成为“单面人”式的“拜物主义者”、“消费主义者”。

第二,消费和人的真实需求完全失去了联系。现代社会中的人不再是按照事先的方案或传统的计划来分配、消费社会产品。个人购买自己喜欢的消费品不再有什么金钱之外的传统制约因素。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一切,尽情地消费一切。他们一看到有新奇的产品上市,有人在购买,就会不加思索地争购,生怕比别少占有,少消费。人们以自己手头的钱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真正需要得到消费品,也不考虑这些商品对自己的健康和环境是否有害,甚至获得消费品根本就

不是出于使用的欲望,只是为了占有它们。人们实际上只是在消费一种幻想,消费成了对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成了与人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这样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人们永不满足,产生愈来愈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这种倾向不是因为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代表人格尊严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对好的食物、艺术品以及书籍的需要增加,而是因为“现代人具有贪婪地占有和使用物品的欲望,并理智地认为,这样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7]

第三,消费是被操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的消费胃口变得越来越大,其趣味也日趋标准统一,因而也就容易对之施加影响和进行预测。资本家成功地利用了人们不恰当的心理和观念,通过广告、竞争和舆论控制了消费。“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8]

第四,异化的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控制形式。消费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需要有紧密的联系。资本主义通过提供高标准的物质消费生活,不断产生和满足人们的“虚假需求”,消除了那些因为得不到物质满足而产生的对现存制度的抗议,麻痹了工人阶级的批判意识和政治革命意识,发展了使人们与现存制度“一体化”的更有效的控制新手段,成功地使本来属于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本能需要。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不再是血淋淋的,而是让人“不知不觉的、顺顺从从的、舒舒服服的。”

消费异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症结所在。首先,它牺牲了人的全面精神生活。由于人们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第一需要,把物质利益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这样就将自己降低为一般动物,精神上必然充满着空虚和痛苦。人的幸福本应当是多方面的需求全面得到满足,如果只单纯地以拥有财富和享乐越多为满足,越忽视自己精神方面的追求,就越容易被控制,越不自由。人的实现、本性和自由发展都会因此受到社会异己力量的无情压制。

其次,消费异化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增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必然会产生生态问题。资本主义为了满足人们高标准的、越来越多的、超过真实需求的物质消费,维持他们与现存制度的一体化,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实现资本的扩张,必须能够保证从自然界源源不断地获得资源,提供大量的商品。而经济增长总是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适应人们不断扩大的虚假需求和资本所要求的无限扩张的生产能力必然要与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生态承受能力发生尖锐的矛盾,对自然进行的过度掠夺终归要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对人的报复。

这样的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但它在一切社会现象上表现出来的却又似乎是合理的。马尔库塞指出,人们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为了维持这种“不合理性的合理”,就必须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效率,继续增加和扩大消费异化中的那些舒适面,把资源的浪费变成满足人的需要,把对环境的破坏变成是建设。

生态危机论

生态危机是人的本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它的最终根源是科学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注意并提出生态问题,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明确和具体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以私有制和利润为原则的,它规模大,资本、技术、劳动力高度集中,这种生产本质上是暴力的,最威胁和损害生态平衡。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它扩大对自然的掠夺,毁灭性地滥用自然资源,污染环境,成为自然界无法承担的重载。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异化还加剧了人的攻击情绪。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对此进行操纵,使人的攻击性广泛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并借助于技术工具把攻击性行为引向“侵犯自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表明,“这个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9]

法兰克福学派在消费异化和生态等问题上,并没有始终抓住他们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关系这个根源性的问题,而是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这些问题背后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根源,从而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他们认为:

第一,科学技术产生和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奴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同自然发生了分离,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发展了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迄今为止,人类在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秩序。由此看来,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的机器更为完善而已。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这其实是“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使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越来越沦为劳动的工具,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成了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飞轮,人的本质存在日益消失。在异化的消费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也已成为服从资本扩张的牺牲品,甚至人们的正常交往都变得像是在利益控制、驱动下的机械化了,人们之间不理解、不信任,冲突和矛盾在不断加剧。这一切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为背景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促进了消费的异化。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高生产、高消费、高福利和商品文化等,大多数人尤其是非特权阶层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分享到了科技文明的成果,汽车、高级音响、现代化家用电器和厨房设备成了大众家庭的常见之物。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帮助满足并强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产生了富裕社会的破坏性和压抑性——消费异化。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是依靠科学技术维持的。尽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但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帮助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依靠的是科学技术的维持。科学技术已经取代

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和控制形式,成了新的极权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它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自主,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而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技术的合理性并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造就出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是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或者说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科学技术决不是当代中立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们几乎全都是借助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统治。它在现存工业社会中得到特殊的设计和应用,被当作一般的需要手段,构成了人对人统治方式的基础。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操纵性功能已渗透于每一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它的控制。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和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合理性的辩护中,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并同样具有欺骗性。人们明明生活在一个恶劣和对抗的世界里,麻木和惴惴不安,以异化的消费压抑苦闷,但它却向人们展示一种和谐美满的假象和值得人们活着的社会幻想,预先封闭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人的自由解放,维护现存统治。在消费异化中,它给人一种需求不断被满足的“幸福感”;在生态问题上,科技的发展也似乎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相比其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更为直接。它的单面性、实利性、功利主义、反辩证法以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成为统治工具和意识形态,能够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提供新的“合法”性证明。

第三,科学技术直接具有破坏作用,会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迅速发展,既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强化了人们本来就无止境的欲望。在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造成不良后果,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危及人类社会和未来的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就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造成的。这种现代化大生产既依赖于自然,又影响自然。科技文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为世界”,彻底“人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深深地敌意化。凭借着科学技术,“我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了自然。我们的占有欲及我们的敌意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宝库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消耗殆尽,而面对人类的野蛮行为,自然将会自卫。”^[10]科学技术造成了生态危机,而它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又无能为力。“我们对技术发展的预测,不可能精确到知道哪些原材料在将来能在技术上被替代或者重新制造出来。”^[11]

解决的途径

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丝毫的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对人本能的压抑和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必须同现有的一切事物进行完全、彻底的决裂,否定并摧毁一切社会文明,包括建立在文明、科学技术之上的社会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能从人的解放和健全的方面来进行革命,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和完美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马尔库塞认为,我们进行自然革命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本身。这场革命的动力不再是要要求改变贫困,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获得解放,人道地占有自然。这场革命要着重于消费领域,改变人们在消费异化中的那种“需求”和“欲望”。

弗洛姆认为,未来没有消费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健全社会应该是以人为中心,能满足人的主客观需要,使人不再是消费商品和实现利润的工具。现在导致社会不健全有经济、精神和心理诸方面的原因,只有在工业与政治组织、精神与哲学、个性结构与文化活动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革命性变革,促成人与人团结友爱,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和理性,才能消除人们不正确的消费心理和幸福观,实现有助于人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的人道化消费,走向健全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既从理论上,又从现实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愤慨的批判,却没有能进一步提出有实践意义的革命措施和步骤。正如一些批评家们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批判性而非建构性。即使马尔库塞最后一部总结学生造反和新左派运动的重要著作《反革命和造反》仍然是如此。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519页。
- [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 [5][6]弗洛姆:《爱的艺术》,陈维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98、104页。
- [7]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 [8]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 [9]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1页。
- [10]弗洛姆:《占有或存在》,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7页。
- [11]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责任编辑:力 昭]